

《论衡》版本源流考

郑易林

内容摘要:南宋乾道三年洪适主持刊刻的绍兴府本是《论衡》所有版本的共同祖本。这套书版在宋、元、明三代递经修补,反复印制,影响广泛。根据此版不同时代印本的文本特征,可以推测《论衡》其他版本的来源:明清以后通行的通津草堂本,应该是以元代至元六年宋文瓚修补本为底本刊刻的,它又衍生出《汉魏丛书》本、闽光表刻本以及《广汉魏丛书》本;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十五卷小字本,则以嘉靖元年补版之前的某个印本为依据。具体考察《论衡》绍兴府本的递修细节,有助于厘清该书宋元明各种版本间的源流关系,对异文的是非判断也有裨益。

关键词:《论衡》 版本 印本 递修本

东汉王充的《论衡》凡八十五篇,分为三十卷^①,这一编次很早就已经固定下来。谢承、范曄所作的《后汉书》都记载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②,葛洪的《抱朴子》也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馀篇”^③。历代官私目录大多著录《论衡》三十卷^④,只有《隋书·经籍志》所说二十九卷例

①第四十四篇《招致》有录无书。

②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八《杂文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绍兴年间浙刊本,2013年,第1593页。范曄撰,李贤注:《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9页。

③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四三《喻蔽》,中华书局,1991年,第423页。又《古今事文类聚》引《抱朴子》佚文,言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儒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2年,第534页。

④例如《日本国見在書目錄》《旧唐书》《新唐书》《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记作三十卷。另外,唐人马总《意林》记载《论衡》为二十七卷(马总编纂,王天海、王韧校释:《意林校释》卷三,中华书局,2014年,(转下页))

外,周中孚、余嘉锡都认为,这是因为《隋志》没有计入最后的《自纪》一卷^①。

据史料记载,《论衡》最早刊刻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该本已经亡佚,主事者杨文昌的刊刻序言还保留在南宋以后的《论衡》刻本中^②。南宋乾道三年(1167),时任绍兴知府的洪适重刊《论衡》,这是该书传世诸版的共同祖本。

关于《论衡》的版本源流,前人已经有了不少研究。岛田翰最早对《论衡》各个版本做了概述,但误判日本宫内厅本为南宋光宗刻本^③。黄晖所作版本源流图沿袭了岛田翰的观点,进而误将宫内厅本与元明递修本分作两个系统^④。晚清藏书家曹元忠订正了岛田氏的错误,推断宫内厅本为洪适所刊^⑤。日本学者阿部隆一通过分析刻工姓名,具体论证出宫内厅本就是乾道三年洪适主持刊刻的绍兴府本^⑥。

总的来看,前人研究多集中于日藏本,而对后世的其他版本认识不足;至于各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更有不少疑问需要澄清。元明递修本、通津草堂本的底本与绍兴府本是什么关系?通津草堂本流传甚广,它衍生的明代刻本彼此间的关系又如何?另外,有一种来由不明的十五卷本《论衡》,学界旧称“元小字本”,它又是出自何本?本文通过对校《论衡》宋元明诸本,考察绍兴府本的递修过程,以期厘清诸版之间的源流关系。

(接上页)第334页)。北宋的杨文昌共搜集了当时九种《论衡》,其中两种史馆本为三十卷,而七种俗本也是二十七卷。元人韩性在《序》中也提到“世所传本或为二十七卷”,可知二十七卷本的《论衡》虽不见于唐宋官私目录,但元代以前一直在民间流传。

①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11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第901页。

②杨文昌《序》见载于国家图书馆藏绍兴府刻元明递修本、十五卷小字本、通津草堂本、《汉魏丛书》本等。日本宫内厅本无杨序。

③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依据点校序言,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的写作始于1899年,至1903年完稿,由东京民友社首次刊行。

④黄晖:《论衡校释》自序,中华书局,1990年,第7-8页。

⑤曹元忠藏元修公文纸印本跋语。跋语写作时间为辛亥(1911)三月,录文见陈先行、郭立喧编著:《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413-414页。

⑥阿部隆一:《宋元版所在目录》,《阿部隆一遗稿集》第1册,汲古书院,1993年,第126页。

一、乾道三年绍兴府刻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现藏一部南宋时期刊印的《论衡》(索书号:500·8),存卷一至卷二十五,阙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分十二册,经狩谷掖斋、冈本况斋、木村正辞、细川十洲递藏^①。版框长21.4厘米,宽14.6厘米^②,半叶十行,行十九至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下题卷次、叶次,下象鼻记刻工名。宋讳缺笔有“玄弦絃絃懸朗敬惊竟弘殷慙框筐胤恒贞微惩树竖戍让煦恒完构购慎”等,至孝宗“慎”字,可见刊刻时间应不早于孝宗朝^③。

如上文所述,关于这一版本的刊刻时代,前人曾有不同认识。从刊刻主持者洪适入手,还可以对前人的分析略作补充。

乾道二年,洪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使^④,在任上先后刊刻了《隶释》《论衡》《元氏长庆集》《隶续》等四部著作,书版都保存在会稽蓬莱阁^⑤。洪适所刊的《隶释》《隶续》已经亡佚,但《元氏长庆集》还有传本,可以用来与宫内厅本《论衡》的刊刻情况相参照。

依据洪适跋文,《元氏长庆集》刊刻于乾道四年^⑥,此书尚存两种残本:第一种藏于静嘉堂文库(索书号:102·36),为竹添光鸿旧藏,存卷四十至卷四十二,一册,傅增湘判断“此则乾道四年洪适刊于越州蓬莱阁者”^⑦。第二种存于东京大学青洲文库(索书号:A00-5824),递经新见正路、浅野长祚、渡边信收藏,存卷四十三至卷四十六、卷四十八,凡五卷,装订为一册^⑧,宋讳缺笔有“玄弦敬惊弘惩完慎”。以上两本的版式完全一致,刻工毛昌共见,可以认

①宫内厅書陵部:《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72页。

②矢島明希子:《宋版·論衡》,《圖書寮漢籍叢考·図録編》,汲古書院,2018年,第143页。

③宋刊本中以回避当今皇帝名讳为常例(详见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铎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30页)。关于宫内厅避讳字的情况,顾歆艺做了详细考订(《日藏宋版〈论衡〉考辨》,《中国古籍文化研究 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記念論集》上卷,东方書店,2018年,第224-225页)。

④脱脱等:《宋史》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1564页。

⑤钱大昕:《洪文惠公年谱》,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61页。

⑥洪适:《盘洲文集》卷六三《跋元徽之集》,《四部丛刊初编》,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1919年,叶八。

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901页。

⑧图版已在“東京大学学術資産等アーカイブズポータル”官网公布。1995年东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漢籍とその旧藏者たち”展览会上,将此版认定为“南宋孝宗至宁宗本”。

定为同版。下面胪列《论衡》与《元氏长庆集》的刻工姓名,以便比较:

《论衡》:方伯佑、毛奇、毛昌、王永、王存中、王林、王玠、王政、朱章、宋端、李文、李昌、李宪、周彦(或单字“彦”)、卓佑、卓宥、洪悦、洪新、徐亮、徐颜、许中、高秀、高俊、张谨、陈明、陈俊、梁济、童志、杨昌、赵通、刘文、潘亨。^①

《元氏长庆集》:毛昌、王存中、包端、李文(或单字“文”)、李询、李昌、李宪、周彦、许中、陈明、刘文、潘亨。

由此可见,这两种版本的刻工重合度极高,《元氏长庆集》现存的十二名刻工中十名见于《论衡》。再考虑到两种刻本避讳一致、字体接近,可以进一步认定宫内厅本《论衡》的刊刻者确是洪适。

洪适在《论衡》跋文中介绍了此书的刊刻缘起与过程:

右王充《论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帐中异书,汉儒之所争睹。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僚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堂舍盖之意。乾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②

学界一般认为,洪适本是北宋的杨文昌刻本的重刊本^③。但从这段跋文来看,该书“转写既久,舛错滋甚”,“以数本俾僚属参校”之后才写定全书。由此可以推测,绍兴府本《论衡》的文本来源不只有北宋刻本,还有当时流传的若干写本。宫内厅本正文间的双行小字,应该就是当时留下的校勘记^④。这些校语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记录异文,记为“或作某字”“一本作某字”“一

①笔者依据宫内厅馆藏复制本记录刻工。前人对宫内厅本的刻工记载略有差别,可参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册,汲古书院,1989年,第175页;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表》,《阿部隆一遗稿集》第1册,汲古书院,1993年;矢岛明希子:《书陵部本宋版〈论衡〉について—上海図書館との比較検討》,《図書寮漢籍叢考・論説編》,第94页。

②洪适:《盘洲文集》卷六三《跋论衡》,叶八。此跋文又见国家图书馆藏十五卷小字本《论衡》的卷末。

③绍兴府本在初刊时应该已经收录了杨文昌《序》,是故国家图书馆藏绍兴府刻元明递修本中仍存录此序。元人韩性在元修本序言中提到:“宋庆历中进士杨文昌所定者,号称完善。番禺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韩性认为洪适是重刻了杨文昌本,前代学者多持此论,如瞿镛、黄晖推断元明递修本源出杨文昌刊本。不过,洪适在刊刻跋文中未提及杨文昌所刊《论衡》,现在也无从知晓杨本的具体刊刻情况,二者的刊刻关系难以遽断。

④黄晖因未见宫内厅本,所以认为这些小注“是读者随手旁注,不像是出于正式的注文”(详见黄晖:《论衡校释》自序,第6页)。考察宫内厅本可知,这些注文在绍兴府本最初刊刻时就已经存在,并非后人所加。

有某字”等;二是注释音义,记作“宜读某字”“读为某字”。不过这些校语的内容并不完善,偶有错误,并且还存在不少正文被误刻入小注中的情况^①。

二、绍兴府刻元、明修本

绍兴府本的书版历经了元、明两代修补。元修本现存两部残卷,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元、明两朝递修本存两部完本,均藏于国家图书馆,以明代补版叶为主,虽是全本,但由于补版的文字质量不佳、版叶漫漶严重,所以学者研究较少。事实上,考察绍兴府本的递修细节,不仅有助于了解书版的储存与修补情况,更是厘清《论衡》版本源流的关键所在。

(一)递修本概况

现存的两部元修本都以公文纸刷印,可从公文内容推测其印刷时代。

一部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828438-39,以下简称“上图本”),存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凡五卷,为曹元忠旧藏。《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收录了卷二十七首叶照片,记录其版框高 21.6 厘米,宽 14.7 厘米^②。对比可知,此本的版式、字体与绍兴府本一致。曹氏以纸背公文的延祐纪年、刻工姓名为依据,判断该本为“宋洪适会稽蓬莱本、元宋文瓚所补刻者”^③。矢岛明希子延续了曹氏的观点,并逐条记录了纸背公文内容,其中以延祐五年、六年的卷宗目录和财政文书为主^④。

另一部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元修公文纸印本”,藏于南京博物院,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凡四卷^⑤,笔者未见。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提供了此本卷十七叶十 b、叶十一 a 的书影^⑥,对比可知与宫内厅本同版。但《校勘记》未提及元修版的情况,纸背公文的具体时

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写版时出现的失误。另外,日本学者山田胜美等猜测,这是为了调整字数以便于印刷(山田胜美等:《宋本〈论衡〉校勘记》,《论衡固有名词索引》,大东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4页)。

②詹福瑞主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1册,索编号 0291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③陈先行、郭立暄编著:《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第413-414页。笔者辨认此本的南宋刻工有:毛奇、王政、梁齐、许中、陈俊、赵通、周彦、徐颜、李文,与绍兴府本的刻工基本一致。

④矢岛明希子:《書陵部本宋版〈論衡〉について—上海図書館との比較検討》,第104-105页。

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⑥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1年第2册,1926年,第1页。

代、内容也无从考察。

绍兴府刻元、明递修本现存两部完本,均藏于国家图书馆,为叙述方便,下文简称为甲本、乙本。甲本(索书号:06897)分八册,经钱谦益、毛晋、黄丕烈、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此本有钱谦益批点、黄丕烈跋、叶昌炽题款,《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收录^①,《中华再造善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乙本(索书号:07542)分十四册,为蒋凤藻旧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②。

甲、乙两部同版,版式与绍兴府本基本相同。依据其中收录的至元七年(1341)韩性《序》^③,可知元人宋文瓚曾主持过补刻。同时,卷首牌记又记载了“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结合版叶上象鼻的补刊年记,可知此本还历经明弘治十七年(1504)、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元年(1522)三次补刻。根据补刊年记和字体风格判断,全书以弘治、正德的补版叶为最多。

关于甲、乙两部原版叶的性质,学界未有定论。黄丕烈、瞿镛认为它的原版叶是宋刊本,后经元、明递修^④;张金吾、黄晖则判断是元刻本^⑤。国家图书馆书目定为绍兴府本^⑥,《中华再造善本提要》也延续此说^⑦。但随着宫内

①詹福瑞主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3册,编号0074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第560页。张元济撰,陈先行整理:《〈涵芬楼烬馀书录〉底稿本》第6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09页。

③从序文中提及的人物来看,此“至元”为元代顺帝的后至元。至元六年后已改元为“至正”,此“至元七年”实为“至正元年”。韩性《序》中犹言“至元七年仲春”者,曹元忠推断“诂绍兴僻处海隅,未及知邪”?

④国家图书馆藏元明递修本甲本卷末黄丕烈跋文。录文可参黄丕烈:《莞圃藏书题识》卷五,《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三,中华书局影印金陵书局本,2006年,第108页。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0册,中华书局影印光绪二十四年瞿启甲刊本,2006年,第238页。

⑤张金吾撰,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四,中华书局,2012年,第331页。黄晖:《论衡校释》自序,第9页。

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四《子部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52页。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391页。

⑦张燕婴:《〈论衡〉提要》,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编著《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01-403页。张燕婴依据严绍璎《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中所记的宫内厅本版式(参见严绍璎:《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58页),认为与此本若合符节。

厅本被国内影印出版、书陵部又公布了彩色图版,这个观点受到了挑战。曹亦冰发现二者虽然版式相同,但字体各异,推测宫内厅本的刊刻时间更早^①。张燕婴也认为,甲本的原版叶是绍兴府本的翻刻本,但难以确定翻刻时间^②。

笔者认为,甲、乙两部的原版叶就是绍兴府本。首先,与宫内厅本对照,甲、乙两部有九叶与之非常接近,分别是:卷七叶七、叶八,卷十二叶十一至叶十六,卷十五叶六。宫内厅本卷十二叶十三左侧、叶十四右侧、叶十五左侧的版框边缘各有一处细微的横向版裂,甲、乙两部相同位置的裂痕形状完全一致,据此可证三者同版。不可否认,九叶中的个别字形在三者间存在差别,这应与版片在不同印刷阶段的磨损状况有关。其次,上图本中有三叶元代补版叶与甲、乙两部同版,分别是:卷二十八叶十三、叶十四、卷二十九叶十一,前两叶刻工为“杨”,后一叶刻工难辨,可见甲、乙两部是在宋文瓚的元修本基础上继续补修而来。

两部印本的刷印时间略有区别。比较甲本的《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与乙本的胶卷,可见乙本上象鼻处“弘治十七年补刊”“正德十六年补刊”“嘉靖元年刊”的补刊年记在甲本中存在被人剜去的情况。因此,乙本的印刷时间较甲本更早。

另外,天一阁存一部绍兴府刻元明递修本残卷,共十三卷(七至十、十八至二一、二六至三十)^③,分三册,笔者未见。

(二)元代修补情况

写于元代至正元年(1341)的韩性《序》为元代修补的过程提供了基本信息:

宋庆历中进士杨文昌所定者,号称完善。番禺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灭,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瓚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序文中提及的校正者克庄公是韩玉伦徒,字克庄。元人虞集的《郑氏毛诗序》中提及,“西夏斡公克庄……自南行台而貳闽宪也”^④。虞集此文作于至

①曹亦冰:《〈论衡〉影印说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②张燕婴:《〈宋本论衡〉序言》,《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翻乾道三年绍兴府刻宋元明递修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③庄立臻主编:《天一阁博物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49页。

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一《郑氏毛诗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1922年,叶九。

正元年十一月,这一年斡玉伦徒为福建廉访副使,在此之前他任职于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与韩性《序》所述相合。补刻者宋文瓚,字子章。元人黄潜至至正二年三月写作的《绍兴路总管宋公去思碑铭》的序中说:“至正二年,南阳宋公守越之又明年也。”^①以此推算,宋文瓚应在至元六年(1340)始任绍兴路总管。可见洪适刊刻的绍兴府书版长期存于绍兴本地,故斡玉伦徒、宋文瓚在任期间得以校勘、补刻。次年仲春韩性已写成此序,也可推测绍兴府书版基本是在至元六年完成的修补。

考察元代的具体补版情况,上图本是重要参照。笔者仅见此本电子图版,无法考察纸背的公文纸内容,所以下面的讨论仅涉及元人的版面修补情况。

从上图本的残卷来看,至元六年时的书版磨损情况已经较为严重。现存的末尾五卷共计七十一叶,三叶是仅有界行的空白叶,十七叶存在局部补版,有墨钉,补刻文字均集中在每行的起止位置。另有十三叶为补刻叶,版式与原版一致,部分上象鼻记字数,下象鼻多有刻工,可辨认者有:任、良、杨、昌、杨春。补版字体与原版较为接近,只是“刀口极锐,笔画瘦挺”^②,稍有差异。另外,上图本卷二六叶八是局部修版的原版叶,而在国图的递修本中却已是补版叶,依据字体与刻工名“昌”,可判断是由同一位元代刻工完成的。由此可推测,上图本此次补版后不久,又进行过一次补版。

元代补版质量较高,讹误较少。因为上图本与宫内厅本的卷次恰好错开,不存在可比对的版叶,所以只能先根据上图本补版叶的版面特征,甄别出元明递修本前二十五卷中的同批次补版叶,再与宫内厅本进行对比。虽然韩性《序》说斡玉伦徒对原版重加校正,但从现存的补版叶来看,并未发现校勘成果,反倒出现了个别形讹:如《遭虎篇》(卷十六叶七b1)“谷食乏贵”讹作“谷食之贵”,《纪妖篇》(卷二二叶三a9)“其后将霸”讹作“其复将霸”,(叶三b6)“赐我二箭”讹作“赐我一箭”等等。有些讹字出现在每行起止的位置,可能是补刻者在书版漫漶不清的情况下仅凭臆测而增补的。

绍兴府书版后来从绍兴转入南京国子监中,《南雍志·经籍考》著录了这套书版:

《论衡》三十卷共五本,共脱三十一板。至元六年重抄于白云方丈。

盖元时已新之,至我朝盖屡新之矣。^③

①阮元主编:《两浙金石志》卷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光绪十六年刻本,2012年,第416页。

②陈先行、郭立暄编著:《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第413页。

③梅鹗等:《南雍志·经籍考》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影印《观古堂书目丛刊》,2006年,第460页。

这里“白云方丈”的含义已不可考,但至元六年重刻的时间与前文所考相合,即宋文瓚任绍兴路总管时期主持的补刻。《南雍志·经籍考》是梅鹗嘉靖二十二年(1543)所作,其中所载的国子监书版来源不一,有些承继自元代集庆路儒学,也有国子监自刊或其他机构捐赠的^①,但其中并未提及这套绍兴府书版收入国子监的具体时间和途径,只是将该书版归为“天顺年间官书”。据此可知,它被转入国子监的时间不晚于明英宗天顺时期。

(三)明代修补情况

梅鹗在目录中又称此书版“至我朝盖屡新之矣”。依据国图所藏的甲、乙两部上象鼻所记,明代补版可考者有三次:

第一次,弘治十七年。四周双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或双黑鱼尾。上象鼻处记“弘治十七年补刊”,下象鼻有刻工名,刻工前多题“监生”二字,字体为自然书写体。第二次,正德十六年。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上象鼻处记“正德十六年补刊”,无刻工名,字体扁方,笔画多被拉直。第三次,嘉靖元年。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上象鼻处记“嘉靖元年刊”,下象鼻多无刻工名,字体方正、笔画平直。

明代这三次补版文字质量欠佳,新增了大量讹误,试举第十五卷的几例:衍文者,如《顺鼓篇》(叶十八 a3)“一丸之艾”,嘉靖补版“一丸”前衍一“与”字。脱文者,如《明雩篇》(叶八 a10)“未可用也”,弘治补版脱“未”字。倒文者,如《明雩篇》(叶八 a4)“巷市五日”,弘治补版“巷市”倒为“市巷”。误文者,如《顺鼓篇》(叶十三 b9)“流入于川”,弘治补版“流入”误为“流出”。形讹者最多,如《变动篇》(叶四 b8)“同穴而处”,正德补版“穴”讹作“宀”。明补版不仅刊刻不仔细,且多用俗字,如“坐”作“坐”,“肯”作“肯”,“桑”作“桑”,“叫”作“叫”等。另外,上文已经提到,绍兴府书版在元人补刻时,每行起止位置的文字就多有磨损,这个问题在明代补版中更为严重。明补版每叶、每行起止处的文字常常与原版存在一两字的差别,并且文字讹误也多出现在这些地方。

除此之外,元明递修本中还有一些版面的修补时间、地点尚不明确。这些版叶的版式与绍兴府本基本一致,但上象鼻没有补刊年记,字体也与上述的元、明补版有明显区别。从文字质量来看,它们略逊于至元六年补版,但优于弘治以后的补版,偶有形讹:如《率性篇》(卷二叶十四 a9)“闾导牖进”,“闾”讹作“闻”;《吉验篇》(卷二叶二十一 b10)“室内自明”讹作“室内目明”;《偶会篇》(卷三叶二 a7)“美恶是非适相逢也”,“美”讹作“吴”;《儒增篇》(卷八叶七 a3)“夫言入铜柱”,“柱”讹作“枉”等等。另外,它们每行的

^①徐有富:《论〈南雍志·经籍考〉》,《文献》2015年第2期,第108-124页。

起止文字基本都与原版叶一致,且较明补版的版面磨损更加严重,更像是弘治十七年之前的补版,但具体补版时间无从知晓。

综上所述,绍兴府书版在乾道三年刻成以后长期存于当地。元代至元六年,宋文瓚任绍兴路总管时对书版进行了局部修版与补刻。此次补刻的文字质量精善,字体也与原版基本保持一致。其后,这套书版在明代天顺以前转入了南京国子监,在国子监中经历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次补版。因为此时的书版已经破损严重,加上刊刻不精,所以明以后补刻叶中文字讹误颇多。

三、通津草堂本系统

嘉靖十四年(1535),苏献可刊刻了通津草堂本《论衡》,这是明代以后最为流行的版本。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明代刻本:程荣《汉魏丛书》本、阎光表刻本、以及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问题在于,通津草堂本的底本信息并不明确。黄丕烈、瞿镛都认为它来自上述的绍兴府刻元明递修本^①,岛田翰则推断“通津本根源于宋槧明成化修本”^②。基于上文对绍兴府本元、明递修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新的认识。

(一)通津草堂本

通津草堂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同。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白鱼尾,版心题卷次、叶数,下象鼻有“通津草堂”四字,字体属于典型的嘉靖苏式本^③。

静嘉堂文库藏本(索书号:12·1)末卷的刊记云:“嘉靖乙未春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同郡周慈写、陆奎刊”。狩谷掖斋注意到,写版人周慈又见于袁褧刊刻的嘉趣堂本六家注《文选》^④。因为通津草堂本《论衡》与嘉趣堂本

①国家图书馆藏元明递修本甲本卷末黄丕烈跋文。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第238页。

②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第185页。

③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第38-39页。

④狩谷掖斋以家藏通津草堂本对校一部日本宽延三年刊《论衡》(静嘉堂藏本,索书号:101·1),写作识语:“今以家藏通津草堂刻本校毕,其本卷尾有‘周慈写’题字。余别有嘉靖□年袁褧重雕宋板六家《文选》,亦题‘周慈’名,则知通津本又嘉靖刻本也。”此处“嘉靖□年”是留白未填。这条识语后被转录入《经籍访古志》(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解题丛书》,国书刊行会,1916年,第74页)和《古文旧书考》(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第187页)中,为学界所熟知。

《文选》刊刻时间接近^①,刊刻者同为吴郡人,所以雇佣了同一位写版人。

通津草堂本与绍兴府本关系密切,至少有两个证据。第一,绍兴府本可能因为刊刻时叶次标记失误,卷一叶七被分作了上、下两叶^②。这个失误直接导致了通津草堂本《累害篇》的阙叶问题,它所阙的这一叶内容正对应于绍兴府本的卷一叶七下。第二,绍兴府本的双行小注均被通津草堂本沿袭,并且苏献可重新厘清了正文与校语,恢复了那些误入小注的正文。

问题是,通津草堂本所据的底本究竟是绍兴府本哪个阶段的修印本呢?笔者认为,这个底本的刷印时间应在至元六年宋文瓚补版之后、弘治十七年补版之前。前文提及,宋文瓚补版后产生了个别异文,而这些异文均被通津草堂本所继承,罗列如下表1:

表 1

卷次	叶	行	绍兴府本	至元六年补版	苏献可本
十六	七	b1	谷食 <u>乏</u> 贵	之	之
二二	三	a9	其后 <u>将</u> 霸	复	复
		b6	赐我 <u>二</u> 笥	一	一
二三	十	b4	亦不 <u>晓</u> 其忌	要	要
二五	十三	a9	故曰鬼享之 <u>也</u>	祀	祀
	十四	b2	<u>礼</u> ,王者祭天地	树	树

可见,通津草堂本底本经历了至元六年的补版,所以沿袭了这些讹误。同时,前文也罗列了绍兴府本与弘治、正德、嘉靖等其他时代的补版叶之间的异文,但这些异文并不见于通津草堂本。由此可知,黄丕烈对通津草堂本的来源判断过晚,通津草堂本使用的底本与明代补版无关,苏献可很可能是依据一部绍兴府刻宋文瓚修本而刊刻的。

附带提及,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提到,有一部宋槧明成化修本也阙《累害篇》同一叶,所以判断它就是通津草堂本的底本。据他描述,这本宋槧明成化修本“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槧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

①袁褧在嘉趣堂本《文选》卷前的题记中云:“刻始于嘉靖甲午岁,成于己酉,计十六载而完。”可知此本开雕于嘉靖十三年(1534),至二十八年(1549)完工。

②宫内厅本版心依稀可见“七上”的叶次,但“七下”因版心破损而无法辨认。两部元明递修本的版心部分“七上”“七下”的叶次都得到了保留。虽然这两叶是弘治时期的补版,但也反映了绍兴府本的原始样貌。

‘成化九年补刊’字”^①。如此看来,这部成化修本与国图藏元明递修本颇为类似,只不过后者并没有成化年间补版。黄晖和矢岛明希子都接受了此说^②,但岛田氏所记载的这部成化年间明修本未见任何目录著录,我们无从知晓它的具体情况,不能排除岛田翰记载有误的可能性^③。

通津草堂本来源较早,并且经过了苏献可的校勘,改正了绍兴府本很多明显的错字,所以文字质量较高。以卷十五为例,《变动篇》(叶三 b10)“至诚及矣”,通津草堂本改“及”为“极”。《明零篇》(叶六 b10)“阳颇留,湛之兆也;阳颇久,旱之渐也”一句,该篇前文已言“变复之家,以久雨为湛,久阳为旱,旱应亢阳,湛应沈溺”,可知雨对湛、阳对旱,故通津草堂本改“阳颇留”为“雨颇留”。同篇(叶八 a6)“宜为徙市故”,此处“宜”是“肯”的俗字“冑”之形讹,通津草堂本改“冑”为“肯”。

通津草堂本的不足之处有二。一是改字失之草率。如《明零篇》(叶八 b3):“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云雨之气也。云雨之气,何用歆享?”元明递修本的弘治补版文字相同,而通津草堂本误改上“之”字为“者”,则读为“如云雨者,气也”。黄晖已经指出,这里讲的是所祭祀者“云雨之气”,而非讨论云雨是“气”的问题,因此属于误改^④。二是误加小注。《问孔篇》(卷九叶八 b1)“子曰:‘予所鄙者,天厌之!天厌之!’”下,绍兴府本与元明递修本无注,而通津草堂本“鄙”字下云“一作否”,与今本《论语》相合。但是,王充下文解释说,“我所为鄙陋者,天厌杀我”,可知此处“鄙”不作“否”。《论衡》中的《论语》引文未必与后世通行本尽同,苏献可根据传世本《论语》来校勘,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

(二)其他衍生刻本

通津草堂本对后来的《论衡》版本深有影响。明代后期的《汉魏丛书》本、阎光表刻本以及《广汉魏丛书》本都以它为刊刻的底本。下面先介绍这三种版本的刊刻情况,然后讨论它们彼此的继承关系,比较它们的文字质量。

其一,《汉魏丛书》本,卷首题“明新安程荣校”。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

①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第187页。

②黄晖:《论衡校释》自序,第8页。矢岛明希子:《書陵部本宋版〈論衡〉について—上海圖書館との比較検討》,第100页。

③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论及了宫内厅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以及这部明成化修本,未提及中国所存的元明递修本。他所见“成化九年”的补刊年记可能已被后人剝去,因此在国图甲、乙两本中均不得见。也不排除他偶然误记,将元明递修本中弘治、正德、嘉靖的补版时间记为成化。此处存疑。

④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五《明零》,第668页。

文双行同。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白鱼尾,版心题卷次、叶次,下象鼻有刻工。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SB/081.32/2189:5),丛书卷首有万历二十年(1592)屠隆《序》,《论衡》卷首有万历十六年(1588)沈云楫《论衡序》、万历十八年(1590)虞淳熙《论衡序》,可知此本刊刻于万历年间。

其二,阎光表刻本。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SB/111.27/7293),每卷卷首题“刘光斗评,马元、施庄参评”,并记录了其他参评者三十四人。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同。四周单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上象鼻有书名,版心题卷次,下题叶次,无刻工。从卷首施庄《序》和阎光表《叙》的写作时间来看,此本刊刻于天启六年(1626)。

其三,《广汉魏丛书》本。明末何允中以程荣《汉魏丛书》为基础,将三十八种书目增广为七十六种的《广汉魏丛书》。此版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同。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白鱼尾,上象鼻有书名,版心题卷次、叶次,无刻工。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2918)^①,丛书卷首是屠隆《序》,且《论衡》卷首亦载万历十八年虞淳熙《论衡序》,每卷卷首题“汉会稽王充著、钱震洄阅”。

关于《广汉魏丛书》的刊刻时间,学界未有定说。部分学者仅根据丛书卷首屠隆《序》的写作时间,判断为万历二十年刊本^②。其实只要稍加考察,便可知此本应刊刻于崇祯时期^③。刊刻者何允中为浙江仁和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④。审阅者钱震洄也是仁和人,万历三十年(1602)生,崇祯四年(1631)进士^⑤。可见丛书刊刻时间应晚至崇祯时期,绝不可能在万历二十年。

以上三种版本的序跋都未明言它们与通津草堂本的关系,而且阎光表

①笔者未见复旦大学所藏原本,使用的是《子藏》收录的影印本。详见方勇编纂:《子藏·杂家部·论衡卷》第8、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2016年。

②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42页。李春光:《古籍丛书述论》,辽沈书社,1991年,第58页。《子藏·杂家部·论衡卷》的影印说明也写作“明万历年何允中刊《广汉魏丛书》本”。

③施廷镛编著:《中国丛书知见录》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手稿本,2005年,第244页。复旦大学古籍部官网的解题中,《广汉魏丛书》的刊刻时间也写作“明崇祯间”。

④嵇曾筠、李卫等撰,沈翼机、傅王露等纂:《浙江通志》卷一三三《选举十一·明进士》,上海古籍出版社复制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二十五年浙江官书局重刻本,1991年,第2353页。

⑤《崇祯四年进士履历便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8册,宁波出版社影印,2006年,叶四。

刻本的序中还声称,他是以北宋杨文昌刻本为底本而刊刻的。但是通校第十五卷的文字之后,可知这三种版本都沿袭了通津草堂本对正文与小注的区分,也基本继承了通津草堂本的校勘成果,并且卷一《累害篇》同阙四十字,因此可以判断它们都是通津草堂本的衍生本。

从文字质量来看,《汉魏丛书》本最佳,这主要得益于程荣的校勘,如《明零篇》(叶九 a1)“或赍酒食,请于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终不为之陨涕”,程荣改“未”为“求”,与下文“夫泣不可请而出,雨安可求而得”承接。同篇(叶十一 a5)“建初孟季,北州连旱,牛死民之,放流就贱”,程荣改“牛死民之”为“牛死民乏”。不过程荣也有刊刻失误或改字武断之处。如《顺鼓篇》(叶十五 a3)“雨久不霁,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破螺、坊,为其得实”,此处“捕斩”与“椎破”对举,程荣本“破”讹作“被”字。同篇(叶十七 a9)“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程荣改“明”为“鸣”,此处文义本通,改字失于草率。

阎光表刻本、《广汉魏丛书》同时参考了通津草堂本和《汉魏丛书》本而刊刻,试将第十五卷中的几例列表 2 如下:

表 2

篇目	叶	行	绍兴府本	苏献可本	程荣本	阎光表本	何允中本
变动	三	a10	未见吏民	夫	夫	夫	夫
	三	b10	至诚及矣	极	极	极	极
	四	b1	其所之地	死	死	死	死
明零	六	b10	阳颇留	雨	雨	雨	雨
	八	a6	宜为徙市故	肯	肯	肯	肯
	八	b3	如云雨之气也	者	者	者	者
	九	a1	未出其泣	未	求	未	未
	十一	a5	牛死民之	之	乏	乏	乏
顺鼓	十五	a3	椎破螺、坊	破	被	被	破
	十六	b5	冀可得衰	愈	愈	愈	愈
	十七	a9	明声响也	明	鸣	明	鸣
	十八	a10	无则心怛忧民之心	恻怛	恻怛	恻怛	恻怛

这两种版本中的文字继承了通津草堂本与《汉魏丛书》的校勘成果,但其中某些改字的失误也被它们沿袭了。这两种版本的文字质量不及它们的底本:阎光表刻本多用俗字,如“救”作“掾”,“肯”作“肯”,“煙”作“烟”,

“土”作“土”等;《广汉魏丛书》本文字质量不佳,出现了大量新的形讹,如“旦”讹作“且”,“宫”讹作“官”,“兆”讹作“九”,“曰”讹作“田”等等,它是通津草堂系统的四种版本中讹误最多者。

综上所述,通津草堂本的底本可能是一部绍兴府刻元修本。它不仅来源较早,而且刊刻者苏献可厘清了小字校语与大字正文,并重新校勘、刊正错误,因此质量较高。通津草堂本衍生出了三种明代版本:其中程荣《汉魏丛书》本文字较优,对通津草堂本偶有校正;明末的阎光表刻本、《广汉魏丛书》本虽然同时参照通津草堂本和《汉魏丛书》本而刊刻,但讹误较多。

四、十五卷小字本

《论衡》另有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小字本(索书号:09390),书名题作“新刊王充论衡”,它将原书的三十卷每两卷合为一卷,为十五卷。依据国图中华古籍资源库提供的电子版可知,该本装订为八册,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大黑口、双黑鱼尾,上象鼻题卷次,作“王充论衡卷之某”,版心题篇名、叶次。卷末有杨文昌《序》、韩性《序》、洪适《跋》。为蒋光煦旧藏。

张金吾鉴定为“元至元刊本”^①,所以学界旧称它为“元小字本”。后来,傅增湘、朱宗莱等学者指出,此本文字讹误甚多,并非元本,而是明初书坊所刊^②,但没有论证确切的刊刻时间。

小字本与绍兴府本关系密切,不仅正文中也夹杂着双行小注,而且正文误刻入校语的情况也和绍兴府本基本一致。笔者认为,它所据的底本是一种经历了正德十六年补刻,但还未经历嘉靖元年补版的绍兴府刻递修本。理由约略有二:

其一,小字本与绍兴府本在弘治十七年、正德十六年的两次补版关系密切,它基本延续了补版所产生的各种衍文、脱文、倒文、误文、形讹等错误。如下表3所示:

^①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四,第334页。

^②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中华书局,2009年,第702页。《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收入黄晖:《论衡版本卷帙考》,《论衡校释》附编五,第1299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阎光表刻本(索书号:NC/1135.3/7293)中,民国藏书家伦明在马裕藻处得见朱宗莱这部旧稿,也移录了这则题记。

表 3

篇目	叶	行	绍兴府本	苏献可本	程荣本	闾光表本	何允中本	递修本		元小字本
变动	一	b1	商羊起舞	商	商	商	商	弘治	商	商
	四	b8	父子同穴	穴	穴	穴	穴	正德	穴	穴
明零	八	a2	然后足也	然	然	然	然	弘治	然然	然然
	八	a4	诸公薨	诸公	诸公	诸公	诸公		诸侯	诸侯
	八	a4	巷市五日	巷市	巷市	巷市	巷市		市巷	市巷
	八	a10	未可用也	未	未	未	未		脱文	脱文
顺鼓	十五	a10	各有所主	主	主	主	主	正德	生	生
	十六	a2	绳之丝紫	紫	紫	紫	紫		营	营
	十七	a1	岂言攻哉	攻	攻	攻	攻	弘治	者	者
	十七	a7	下之于上	上	上	上	上		工	工

据表可知,小字本与弘治、正德补版叶的讹误一致,它所据的底本经历了明代这两次补版。

其二,小字本的底本未经过绍兴府本的嘉靖元年补版。甲、乙两部元明递修本中的嘉靖补版很少,只有十八叶,其中两叶文字都被小字本漏刻。可以推测,这是因为小字本所依据的底本中,这两叶存在严重的文字漫漶甚至脱叶现象,导致无法刊刻。其余的十六张嘉靖补版叶,与小字本所对应的文字也存在明显不同:嘉靖补版的这十六叶文字完整、刊刻清晰,而小字本中的这些文字常常出现未刻留白,这种情况在卷二十五叶二至叶六尤其明显。据此可知,小字本底本中的这十六叶还未经修补,版叶磨损严重,所以会与嘉靖元年补刻后的版叶差别很大。

前人诟病小字本的文字讹误颇多,质量不佳。究其原因,这些讹误首先是它所据的底本决定的。这个底本不仅包含了绍兴府本经弘治、正德补版后的种种错讹,且存在部分版叶未完成补刻而文字残缺的情况。另一方面,小字本的刊刻失之草率,又增加了新的形讹、衍文、漏刻、错简等讹误。

综上所述,小字本的底本来源于绍兴府刻正德十六年修本。那么小字本的刊刻时间一定在此之后,即嘉靖年间或更晚。从版面形式来看,它行密而字多,字体扁平、笔画弯曲,起笔处常常带钩。另外,每卷首叶的鱼尾下大多标记一枚纹饰,而其他版叶的相同位置则刊刻篇名。这些特征都与嘉靖

建式本相吻合^①。结合它的文字质量,可推断这是一部嘉靖时期建阳书坊刊行的刻本。

五、结论

以绍兴府本的刊刻与递修过程为主要线索,可以对《论衡》宋元明各种版本的源流总结如下:

其一,洪适在南宋乾道三年主持刊刻的绍兴府本是《论衡》所有传世版本的共同祖本,现存一部残卷于宫内厅书陵部。它的书版在刊印后长期存于绍兴当地,元代至元六年,宋文瓚任绍兴府总管期间为之补刻。从上海图书馆所存残卷来看,此次补版的文字质量较高,补版字体与原版较为接近。其后,至晚在明代天顺年间,这套书版被转入南京国子监中,监生在弘治十七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对书版进行了三次修补,由于补刻不精而产生了大量的文字讹误。国家图书馆所存的两部元明递修本正是补刻后的印本。

其二,绍兴府本不同修补阶段的印本成为了《论衡》其他版本的源头。

通津草堂本的底本是一部经过宋文瓚补版后的绍兴府本。由于它的底本来源较早,且刊刻者苏献可又重加校勘,所以通津草堂本文字质量较高。它进一步衍生出了一批明代的新版本。其中,万历年间程荣刊刻的《汉魏丛书》本校勘细致,讹误较少;晚明阎光表刻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共同参照了通津草堂本和《汉魏丛书》本,但刊刻不精、多用俗字,又新增了不少讹误。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十五卷小字本也源自绍兴府本,它所据的底本是一种经历了正德十六年递修、但还未经历嘉靖元年补版的印本。因为底本自身的文字欠佳,加之刊刻草率,所以这种小字本的文字质量极差,不仅颇多讹误,而且有部分留白未刻之处。结合行款、字体、鱼尾等版叶特征,它很可能是一部嘉靖时期的建阳书坊刻本。

笔者在静嘉堂文库版本调查过程中,承蒙庆应义塾大学高桥智教授帮助。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评审专家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郑易林,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两汉文学文献学。

^①关于嘉靖建式本的特征,参看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40-42、120-138页。